

滨州地区文物

BINZHOU DÌ QŪ
WEN WU ZHÌ

滨州地区文物志编委会编

山东友谊书社





自右起 前排

李 云 于奉华 刘红岩 吴鸿喜

阚明峰

后排

范玉文 朱学山 常叙政 李少南

王 臻

歷史的見證
民族的瑰寶

董鳳基題

學
習
歷
史
創
造
未
來

楊再文



中華文物
祖國瑰寶

辛未



滨州地区文物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委会

编纂顾问：李炳众 于德明

编纂领导小组组长：刘红岩

副组长：刘振洲 常叙政

成 员：周勋臣 王枫桐 徐寿亭

舒高福 张继发 吴玉光

王金普 郭 俊 王泽恩

主 审：孙树勋

副主审：刘红岩 李 云

主 编：常叙政

编 辑：赵阿娜 吕泮林

编 委：刘振洲 常叙政 吴鸿喜 阚明峰

陈季南 郭士云 李少南 于奉华

刘少白 杜树源 赵阿娜 吕泮林

赵 苓 李建荣 王 臻 范玉文

朱学山

序

《滨州地区文物志》付梓，这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。

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、文化古老著称于世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。早在世界其它地区处在洪荒时代，我们的祖先就在世界的东方点燃起智慧的明灯。公元前四世纪前后，战国时期“百家争鸣”所形成的繁荣文化，与西方人引为自豪的古希腊文明东西辉映。公元前三世纪以来，在西方罗马城帮奴隶制文明高度繁荣时，在中国则已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大帝国。从秦汉到元明期间，中国不论在政治制度，还是在经济、科学文化各个方面，都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。璀璨的文化，也曾成为中华民族勤劳、勇敢、智慧的结晶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，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不可动摇的优秀文化传统，使我们这个民族增强了荣誉感和责任感。这是促使人们为祖国、为民族的光明与进步，去创造、去探求、去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。这就使无数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大师像历史的星辰一样光照中华，辉映千秋。

《滨州地区文物志》把滨州地区从古到今的历史，科学而形象的展现出来，并做到了图文并茂，雅俗共赏。将文物研究，美学鉴赏，思想文化的熏陶和积累融为一体。实现知识性和科学性的结合，观赏性和学术性的统一。能促使人们在更深的层次上获得一种观念——一个创造了如此辉煌古代文明的民族，尽

管它在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中落后了，尽管它在当代变革现实的斗争中遇到种种困难，但是，它的悠久历史传统一脉相承地发展了下来，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。它必然能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不断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，创造出辉煌的现代文明，迎来振兴之日，为人类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弘扬爱国主义，宣传社会主义，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，应当成为我们文物工作的着力点。只要狠下功夫，潜移默化，水滴石穿，持之以恒，一定能收到可观的效果。

宋存胜

凡 例

一、本志取事断限力求与近代史相应,上限为 1840 年,下限为 1987 年,个别条目有下延。

二、全志设序、概述,正文基本用篇、章、节、目四级结构。

三、文物保护单位(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近现代纪念建筑物)的记述为名称、年代(新石器时代、朝代年号和公元纪年)、座落地点(县、乡、村)、发现时间、规模特点(建造风格)、保存现状,出土重要文物、历史及科学价值、艺术价值、著录记述情况。文物保护单位级别。

四、文物藏品的记述为:名称、质地、年代、器型描述(器形、纹饰、尺寸),发现征集时间,出土地点及历史、科学、艺术价值、收藏单位。

五、本志记述一律用现代汉语表述,通过客观叙述,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。用语翔实、简洁,并辅以图表、照片。

六、凡地理名称、政府、官职,均按当时的称呼。人物一般直书姓名,不加褒贬,计量单位用公里、米、厘米,用阿拉伯字书写。

七、本志部分条目配有黑白图版,在有关条目释文后注明(图版××页)。

概 述

滨州地区位于山东省北部，黄河下游，渤海湾南岸。下辖滨州、惠民、阳信、无棣、沾化、博兴、邹平一市六县。地理座标为东经 $117^{\circ}15'$ 至 $118^{\circ}37'$ ，北纬 $36^{\circ}41'$ 至 $38^{\circ}16'$ 之间。东临东营市，西部与德州地区接壤，西北与河北省沧洲相邻，南与淄博市相交。

本区地质属华北地台新生代拗陷的东南部，基岩是古生代的沉积地层和前震旦纪变质岩系。在邹平南部为侏罗纪砂岩、红沙页岩。在北部的无棣县大山有新生代玄武岩露出，残存的火山口隐约可见。全区除邹平南部山区外，大部为第四纪沉积覆盖。小清河以南为泰沂山区山前冲积、洪积平原。以黄河、小清河、徒骇河几大水系形成了土地肥沃，水源充足，加之气温适中，光照充裕的自然环境，为古代的人类生息、繁衍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。因而从距今七千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起，这一地区就孕育了一个相当稳定的、生气勃勃的史前人群，并创造了相当水平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。这种文化既不是来源于中原地区，也不是受中原影响而产生，她是山东土著居民——东夷人创造的文化。这种土著文化在相当多的方面，在全省、乃至全国均具有领先的地位，它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，在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发展史上，贡献是卓越的。然而这一发展过程也是极其漫长的。在发展阶段上，它经过了前大汶口文化

(邹平西南村遗址)、大汶口文化(邹平丁公、阳信小韩遗址)、龙山文化(分布邹平、博兴、惠民、阳信、滨州)，几个不同历史阶段。其社会形态为原始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。在当时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先民就是依靠这种原始氏族制度，把每个成员的微弱力量汇集成群体的洪流，冲破自然的各种障碍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。

滨州地区原始文化的确立，是1954年在原滨县的滨城镇十字北街的卧佛台，发现了部分磨光黑陶片、长方形扁平穿孔石斧，因与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出土的文物相同，将其定名为龙山文化遗址。七十年代后期，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田野调查，先后在邹平的鲍家、苑城的丁公、惠民的大商、阳信的刘家、博兴的曹家、利城、村高等地，先后发现了一批龙山文化遗址。八十年代以来，又在邹平的苑城乡西南村发现了早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，在邹平丁公村、阳信小韩村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类型遗址，从而揭开了滨州地区原始社会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序列。大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开始至距今约三千年前，上下近五千年的时间内，滨州地区文化系统的自身特征有了一个框架。以小清河、考妣河流域为中心的邹平、博兴文化区和以徒骇河两岸的滨州、阳信、惠民为中心的文化小区，在该区域内的文化面貌既与周围地区保持着多方位的文化接触联系，又长期保留着自成一系的文化特色，他们都属于东夷人史前文化的系统。

恩格斯在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中指出：人类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是“从学会制陶术开始的。”所以陶器在人类历史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。它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。在原始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，由于陶器的出现，促使人类从采集、渔猎向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生活过渡。因为陶器不仅可以用来蒸煮食物，装运饮水，还可以用来储存粮食和

种子。陶器是产生于农业之后，并促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稳定。所以在全区的早期遗址中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，陶器的出现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农业的大国，也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。因而有关农业的起源在古代的典籍中记载着不少的传说。据《白虎通义》载：“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，至神农，人民众多，禽兽不足，于是神农因天之时，分地之利，制耒耜，教民农作……故谓之神农氏。”这种把农业的发明归功于“神农”的传说，今天看来已是不适当的。在邹平苑城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砍伐用的磨光石斧，翻土用的石铲，收割用的石刀、蚌刀，加工粮食用的石磨棒、磨盘，证明农业经济至晚从距今约七千年前已经开始。农业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和蚌制的，一般都比较笨重，证实当时的农业经济还较为原始，处在火耕刀种阶段。当农业季节到来时，人们把草木砍倒晒干，放火烧光，然后再松土、播种，到收获季节，再进行收割。为了尽可能扩大生活来源，渔猎、狩猎和采集也占有相当的比重。邹平苑城西南村出土的大量石、骨箭头和弹丸，鱼标、鱼钩以及四不像鹿、梅花鹿、獐、野猪、野兔、马、牛等动物骨骼就证实了渔猎、狩猎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。

在邹平丁公遗址中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，平面略呈方形，四周城垣比较规整，城内部分南北长 350 米，东西宽 310 米，面积 10 万平方米。城墙宽约 20 米，残存高 1.5—2 米，夯层厚 5 厘米，夯打比较坚硬。城墙外有宽 20 余米的护城河。城内分布有龙山文化时期的房基、陶窑、窑穴和墓葬。这些史料的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城市的生产与发源，深入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原始公社制解体后，人类进入了历史上

第一个阶级社会——奴隶制社会。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夏代，据文献记载，公元前 21 世纪，夏禹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国。此后经历了商（公元前 16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）、西周（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771 年），到春秋时期（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475 年），奴隶制走向崩溃，前后共一千五、六百年。在奴隶社会里，奴隶主和奴隶是两个对立的阶级。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，奴隶们从事生产劳动。奴隶主可以任意赏赐、买卖和屠杀奴隶。但是，奴隶社会的出现，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很重大的进步，大规模的奴隶劳动，金属工具广泛使用和劳动分工的发展，使奴隶制社会生产关系适应着当时生产力的发展，在它确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，使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科学文化。

滨州地区夏、商、周时期，应是东夷人——蒲姑氏族的地方。这一地区的文化，一方面有着商文化的影响，另一方面又保持着本地固有的传统文化，属蒲姑文化。早期相当夏代的遗址有邹平的丁公、博兴的利城等。相当商代的遗址则遍布全区各县市。在惠民县的大郭遗址发现了一座商代墓，墓中殉葬九人，同时出土了青铜器，玉器 21 件。青铜饅、青铜彝上还铸有“戊”铭文，在滨州市兰家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，并发现了制骨作坊和殉马坑。此外在博兴县的寨卞、贤城，还发现了城址，应是殷末蒲姑氏族的都邑和春秋时期献公的都城所在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殷末有蒲姑氏，皆为诸侯，国此地，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，成王灭之，以封尚父。”《路史·国名记》卷已载：“蒲姑，在青之博兴。”《地志》载：“蒲姑地、北约淄西北五十里。”《山东通知》、《青州府志》都做了类似的记载。郭沫若在《中国史稿》中也主博兴说，近研

究学者多主张蒲姑在博兴柳桥（寨卞）。与史书记载蒲姑都邑地望相吻合。

蒲姑是东夷族的一支。“夷”说文“东方之人也。”“从大，从弓。”说明包括蒲姑在内的东夷人是最早发明和使用弓箭的部落。蒲姑氏族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是一个最为古老的氏族之一，大约从距今约五千年前起，这个氏族就在滨州地区这块土地上，生息、繁衍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。进入西周后期，蒲姑人创造的文化逐渐被融合到齐鲁文化中去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但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蒲姑氏族在西周初年参加了管、蔡及禄父三监与商王之子武庚的叛周，在周公东征的讨伐中，遭到了灭国、毁社、迁君、徙民的最残酷镇压，自此以后，这个在东方曾十分强大的国家完全烟没无闻。

西周末年，周王室势力衰微，形成六诸侯国并立，割据分裂局面。经过长期的战争兼并，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七个诸侯强国。在长达五百余年的分裂割据斗争过程中，各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，逐渐向着同一水平方向发展，为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创造了条件。公元前 221 年，秦顺应历史潮流，统一六国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制多民族国家。秦先后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的有力措施，封建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，农民和手工业工人，创造了比奴隶社会时代丰富得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。

滨州地区，春秋战国一直是齐国属地。这一时期的遗址、城址，遍布全区各县市。高青县的狄城（又称翟城）为“长狄所居”处，千乘城“以齐景公有马千驷牧于青石”因此为名。无棣县的信阳城则为“传韩信下齐所筑”，邹平县的“於陵城即陈仲子所居”处，这些城址的存在，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割据

分裂，动荡战乱的局面。在沾化县的杨家、陈家、郑家发现的古陶窑群，出土大量的灰陶“将军盔”，滤器等，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北部沿海地区的盐业生产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1979年在邹平县苑城乡大省村挖掘一批春秋战国墓，出土了鼎、豆、壶、盘、匜、舟、鉴、剑、戈等青铜器。1988年在阳信县城关镇西北村清理的一座战国墓中，出土石磬一套（13件），青铜钮钟一套（14枚），两套车马器、马饰及青铜鼎、壶、豆、罐、甬、敦、舟等，还有部分陶器。这些墓葬的挖掘与大量文物的出土，对研究齐国的历史，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资料。

两汉王朝，是国力强盛，经济繁荣的统一时期。西汉武帝顺应历史的趋势，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，推动汉王朝进入全盛时期。汉代的遗址遗物在我区普遍发现，大多为战国时期的城址、遗址延续使用到西汉。高青县的狄城，汉置狄县城址，无棣县的信阳城，自西汉初至王莽代汉的二百多年间、一直是阳信县县城所在。邹平的於陵城，战国时齐人陈仲子居处，汉置於陵县城，刘宋为武强县城，隋改为长山县城。朝代更替，易名、城址多数延续使用着。

从西晋末年到隋统一全国，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混乱时期，北方大地经历了东晋十六国，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攻城掠地战乱，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破坏。面对战乱不息，流离失所的悲惨处境，人们自然产生人生无常，苦海无边的思想。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，上至官僚，中小地主，下至一些平民百姓，不惜舍割家珍，心归佛门，竭财事佛。近年来，滨州地区大批佛像的出土，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。引起了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，被称为近年我国佛教考古的重大收获。

全区出土的佛造像中计有：佛像、菩萨像，罗汉像、护法

像、维摩像（或称维摩诘）等。佛像有报身佛、释迦牟尼佛、弥陀三圣佛、释迦多宝说法佛、卢舍那佛。根据佛的身份不同，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。一般是高肉髻、螺髻，身披袒右肩袈裟，通肩式大衣或褒衣博带，手式多作无畏、与愿印、少数双手合十。坐佛多座于束腰四足方床，束腰莲花座，立佛一般脚踏莲花或四足床。菩萨像中，有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。这些菩萨的表现形或多为天男或美女像，有的头戴宝冠，有的戴花佛冠。上身裸，颈饰项圈，璎珞，披巾，下着裙，赤足。手举莲蕾或提香袋，胁侍于佛的左右，也有的菩萨着佛装。罗汉像多是根据世间人来刻画，顶天肉髻或宝冠，胁侍于菩萨的左右。护法像中的飞天，有的举宝珠，有的持乐器（排箫、长鼓、秦琴、钹）。佛传故事中有维摩经变故事，释迦诞生故事，摩揭陀国频毗沙罗王礼佛故事，佛援引弟子故事，键陀惜别故事等。

在出土的造像中，52 尊刻有发愿文，根据发愿内容，大体可分三种类型。一为署官名者；二是上层僧尼；最多是第三类，即：平民百姓。他们发愿的目的，多为“亡父母”、“居家大小”、“兄弟姐妹”，及自身祈求“现世安稳”“无诸悲苦”，“寿命延长”、“愿愿从心”等等。此外，在发愿文中，明确提及造观世音像的占首位，据记载她能拔苦兴乐，苦难的人们只要口念观世音的名字，便能得到她的帮助，人们自然对她就特别有好感。表现在造像上，人们也多把本来属于菩萨地位的观音像着上佛装。

佛教之所以能在当年对百姓产生较广的影响，除了统治阶级的导向之外，其主要原因，恐怕与百姓希望消灾避难、求安求福却又找不到科学的出路和答案的情况下有关。

佛像的出土与佛教在我国的兴衰史密切相连。全区出土佛

像的地点均系寺院旧址，出土时有的放置陶瓮内埋入地下，有是在坑内叠放整齐，排列有序，由此可知，均系当年佛教徒有意埋藏。自北魏至隋，佛教在我国受到两次严重打击，一次是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，太武帝拓跋焘下诏尽诛沙门，焚烧寺院经像，佛史称为“魏武之厄”；另一次是北周建德三年武帝宇文邕下诏废佛，断佛道二教，勒令沙门道士 200 万还俗，并将其所有寺院、土地，铜像等资产全部没收，充作伐北齐的军费。灭北齐后，又毁北齐境内的佛寺经像，驱 300 万僧尼还俗，佛史称之为“周武之厄”。被埋入地下的佛像，大都是在遭此厄运及战乱中，被佛教徒抢救出来埋入地下的幸存者。我们虽无法对滨州地区当年佛教活动的具体情况作出详尽的考证，但大量佛像的出土，至少可以说明佛教当年在滨州地区也是有着深广影响的。

隋的统一，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。唐国家强盛，国际交往频繁，出现了封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。唐代文化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历史影响，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。这一时期滨州地区社会经济、文化都有明显的进步，遗留下来的遗址、文物极为丰富，特别是佛教寺院遗址尤为重要。在博兴县的龙华寺遗址，出土了隋仁寿三年（603 年）立的龙华碑，隋代铜、石像，以及大量的窖藏青瓷器。邹平的礼泉寺，唐开元三年（715 年）立的“大唐齐州章丘县长白山礼泉寺志公之碑”等都为研究中国佛教、书法、绘画及瓷器的历史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滨州地区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文物考古工作也有较多的收获，先后对邹平、博兴、高青、惠民、无棣、滨州、阳信分布的古代桥、庙宇、祠堂、名人故居等进行了调查，搞清了它们的建筑年代、结构布局、建造风格等。这些古建筑的存在，显